

缩小收入差距 促进社会和谐

程思进

(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成都 610101)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社会财富如何分配,是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目前我国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引起人们的关注。社会成员财产分布的差距,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差距都有拉大的趋势。收入差距问题除了转型期存在一定必然性外,分配体制的扭曲放大了这种差距,政府公共政策的缺失以及腐败问题都影响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与合理性。针对收入差距问题,中央已制定了相关政策,其目的是为了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关键词:改革开放;收入差距;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9)01-0017-06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30个年头。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事实雄辩的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1]10}同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面临的问题,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自2003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差距迅速扩大。“收入差距”问题成为最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前,基本上是实行的平均主义,限制了群众的积极性,经济效率很低。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收入差距过大,导致人们心理不平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也会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缩小收入差别,就会危及社会的稳定。不和谐因素的增加,会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一

社会财富如何分配,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十分

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在经济发展较快的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应当体现出公平与合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7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4.6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4%,全年全国税收收入49449亿元,比上年增长31.4%^[2],我国经济总量已占到世界第四位。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绝对贫困人口下降。但是在分配领域仍存在大量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收入差距过大。这种情况的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成员财产分布差距十分明显。据有关专家研究结果显示,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财产总额已占到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50%,低收入10%家庭财产占有总额仅为1%。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已经形成。收入差别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表示。基尼系数在0到1之间。基尼系数为0,表明财富平均分配,为1,则财富集中在个人手里。0.3—0.4为允许的差距,0.4—0.5为差距过大。0.5以上为极端不合理,会引发矛盾,造成社会不稳定。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比世界上多数发

展中国家要低,城市在 0.2 以下,农村在 0.21—0.31 之间,略高于城市^{[3]108}。改革开放以后,1998 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 0.42,2002 年达到 0.46,已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4]。高于美国(0.41)、日本(0.25)、德国(0.30)。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一个现象,我国收入差距拉开的速度很快。从国外情况来看,即使是在比较充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的积累,收入差距的扩大,也要经过长时间的经济发展,才能形成和表示出来。我国收入差距的拉开非常迅速,几乎是不到一代人,贫富差距就拉开了,似乎在“一夜”之间产生了“富裕群体”。据美林集团 2004 年全球报告显示(美林集团是全球最大的生产服务公司之一),中国超过 100 万美元金融资产的人达 23.6 万,总财富为 9690 亿美元。

第二,东西部、城乡、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拉大。东部地区主要指东部沿海一带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省市。西部是指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内蒙古和西藏十二个省市区。以 2005 年 1—3 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例,可以看出东西部收入差距。上海人均收入 7409.72 元,北京人均收入 6850.60 元,浙江人均收入为 6393.15 元,四川人均收入为 2181.73 元,甘肃为 1322.17 元,贵州人均收入为 1291.67 元。中国的贫困县 90% 在西部。2004 年末,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在 688 元以下),西部占了 50% 左右,东部只占 14.3%^[5]。再来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也呈现扩大的趋势。1990 年,农村人均收入为 686.3 元,城镇人均收入为 1510 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58.8%,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54.2%。恩格尔系数指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2003 年农村人均收入为 2622.2 元,城镇人均收入为 8472.2 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45.6%,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37.1%。到了 2006 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 3587 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 11759 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43%,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35.8%^[6]。2007 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 4140 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 13786 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43.1%,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36.3%^[2]。从以上农村、城镇人均收入和家庭恩格尔系数可以看出,17 年来,

农村人均收入增加了 3502 元,城镇人均收入增加了 12276 元,农村收入增长缓慢,城镇人均收入增长迅速。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村下降了 15.7 个百分点,城镇下降了 17.9 个百分点。城镇生活水平远比农村提高快。收入差距拉大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垄断行业收入偏高,最有代表性的垄断行业如电力、石油、民航、铁路、通讯等。这些行业的垄断是自上而下、全方位的,成为网络状。他们把垄断带来的巨额利润用于自身分配,形成“有组织的腐败”。这些企业的职工收入高出非垄断企业几倍,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不仅有极其丰厚的收入,还享有高福利和高消费。而城市里的农民工基本工资水平一般都压到劳动力价值下,并不时拖欠工资。加上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形成一个低收入的弱势群体。

第三,社会贫富分层明显。上个世纪 90 年代,持有人民币 100 万就算富翁,到了今天至少要有美元 100 万以上,才算富翁。到底有多少亿万富翁,没有一个权威统计,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富裕群体”,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富裕群体大体上为三部分人组成,包括: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和少部分国有企业负责人,一部分歌星、影星、球星,以及少数以权谋私的领导干部。私营企业主随着改革的深入,他们经营的范围越来越广,涉及高新技术、食品加工、农业、养殖业、房地产开发、资本经营等领域。邓小平曾说过:“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7]152}先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人群中,多数还是如邓小平所说的“辛勤努力成绩大”的人,当然也有不守规矩而非法致富者。而国有企业负责人中的少数,利用国企改革机会侵吞国有资财成为另类暴发户。部分歌星、影星、球星因其技术高超、知名度高而获得高报酬。至于以权谋私的官员,则因侵吞国有资产和收受贿赂而成为暴富的成员。所以对富裕群体要做具体分析,有的是合法致富,有的是非法致富,有的既有合法因素,也有非法因素而致富的。贫困群体的存在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表明,2006 年末,按人均收入 693 元测算,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 2148 万人;按人均 694—958 元测算,农村低收入人口为 3550 万人。贫困群体还包括亏损企业的职工,失业和下岗职工等。这一部分人是最值得关注的对象。政府的责任就是要尽快让他们脱贫致富,共享

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邓小平在 1990 年和 1992 年两次谈话涉及到同一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8]364}“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8]374}邓小平的讲话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收入差距的确拉大了,但无论国际国内对基尼系数的测算都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已接近和达到“警戒线”的标准值应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应当分析形成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并找出对应的措施加以解决。

二

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收入差距适当拉开是正常的。但是,由于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和分配关系的扭曲,放大了收入差距。在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下,利益分配的机制逐步由政府主导型转变为市场主导型,收入分配也由行政配置转为收入来源多样性,收入差距就表现出来。拿东部地区来说,东部地区工业基础雄厚,科技力量强大,面临大海,交通方便,在改革开放中,占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加上东部地区的管理者和社会成员具有开放和创新的观念,必然在政策感召下先走一步,先富起来。西部地区的生存环境相对比较恶劣,工业、科技、教育又比较落后。在计划经济时期,长期依赖国有资本创造生产总值,依赖政府的扶持。改革开放以后,观念落后,不能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在经济发展中,东部地区的蛋糕做得大,收入当然就高一些,西部的蛋糕做得小,收入当然就低一些。东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就显现出来了。关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以 2006 年为例,农业的 GDP 只占全国 GDP 的为 11.8%^[9],而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70%。这怎么能支撑农业人口的收入增长?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目前农业经济要持续增长已缺乏强大的动力,农业、农村面临新

一轮的改革。城乡收入差距在这种背景下越拉越大。因此,应当进一步促进城乡一体化,实现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只有这样才能逐步缩小城乡差别。至于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问题,不能简单地用减薪、取消福利消费、控制工资总额增长速度来解决。行业之间收入存在差别,具有一定客观性,如传统企业与高科技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问题在于,对特定行业(国有垄断企业)通过法律、法规维护其垄断地位从而保护其垄断利益,形成了垄断行业的高收入。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体制上改革,在行业经营权上,要引进竞争机制,要实施反垄断法。对垄断行业征收开发税、自然资源占用税,上缴国有资产红利。这几项不实行,垄断行业的经营成本太低,所赚利润又归自己,收入当然丰厚。

从按劳分配转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这就要求把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而“要素”本身就是有客观差异性,只不过这种差异所带来的是合理的收入分配。“要素”是指生产要素,包括了资金、技术、管理,当然也包括劳动力。这种分配制度是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是相适应的。但是在目前的分配中,存在着权利、身份等非生产要素的掺和,这就对收入分配的合理差距产生了扭曲,放大了收入差距。分配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剔除分配中的权力因素和身份因素。

第二,政府公共政策有所缺失,也是收入差距存在过大的因素之一。要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是一个综合治理工程,不可能短时间解决。经济体制改革卓有成效,但远未完成。政策上的缺失,体制上的漏洞既存在又有待通过改革进一步消除。在公共政策的取向上,明显表现为投入不足。在吃穿、医疗、教育等领域,我们花了大力气解决问题,但目前尚未形成全社会“基本安全网”。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06 年末 2241 万城镇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比上年增加 6.7 万人;1509 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增加 684 万人^[9]。虽然城乡得到最低保障的人比上年有所增加,但享受低保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 3% 左右,这个数目太低了。2007 年 3 月 11 日,全国政协委员、院士巴德年在政协会上发言说:中国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 WHO 排在世界 144 位,卫生公平性排在世界 188 位。发达

国家医药卫生投入占 GDP 的 10% 以上,印度 6.1%,巴西 7.9%,我国 5.7%,对医药卫生的投入显然不足。民间有一个说法:“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做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医药费用虚高,影响到了老百姓的生活。教育也存在一定问题,以汉字识不到 1500 字为文盲标准,我国达 1.16 亿人口。印度文盲最多,我国的文盲也不少。以 2006 年为标准,农民人均收入 3587 元,可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是 5 千—8 千元,农民怎么供得起大学生? 中央政府花大力气解决医疗卫生和教育问题,2007 年全国人大十届五次会议上,温总理提出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等措施,并从 2007 年起全国农村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这些措施已初见成效。一段时期以来,人们都重视和追求 GDP 的增长。GDP 的增长固然重要,但一味追求其增长,必然带来一系列弊端。如果只管经济指标增长,不计一切后果(包括环境是否破坏、经济效益是否良好、人民是否得到实惠),就会形成泡沫经济。其实,在重视 GDP 增长的同时,还应重视 GNH——国民幸福指数的增长。GNH 包括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以及生态环境指数。GDP 加 GNH 才是比较科学地衡量一国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由于一个时期过度追求 GDP,所以国民幸福指数呈下降趋势;80 年代末为 64%,1991 年为 73%,1996 年为 68%。

第三,腐败的滋生,也影响了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曾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的贾春旺在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及会员代表大会上说,中国在 2003 年 1 月至 2006 年 8 月期间,共查处 67050 人的贪污贿赂犯罪。到 2005 年已有 4 千多名贪官,携公款 50 多亿外逃,这些钱本应纳入居民收入分配,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贪官们的罪行,直接侵犯了群众的利益。再则,寻租理论告诉我们,寻租活动是一些商家和官员获利的重要途径。这里的所谓“租金”不是指地租、房租,而是指政府干预或者行政管制市场形成的级差收入。商品经济中的行政管制,都创造出这种级差收入。房地产商得到的廉价地皮,进口畅销产品得到的许可证都会有租金,办营业执照这样本无租金的事情,由于暗箱操作也形成租金。寻租就是指商家追求租金的活动。追求租金的手段就是行贿,结果是官员(有审批发财机会的人)

得到贿金,商家得到租金。行政权力为一批人制造了发财机会,一批贪官也因此而暴发。仔细观察,贪官后面有一批暴发户,暴发户后面必定有贪官。权钱交易对广大群众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害,再加上公车、公款消费,可以说财政不堪重负。公车、公款消费每年分别为 3 千亿元以上。北京高档餐饮店用餐的 70% 以上是公款消费,仅 2005 年 500 万辆公车,消费约 5000 亿元,这项开支超过了教育、卫生、农业、科研投入的总和^{[10][315]}。中纪委 2007 年 5 月 30 日印发了《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重申八条纪律,防止腐败的滋生。胡锦涛总书记 2007 年 1 月 9 日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提出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开拓进取的锐气;进一步增强公仆意识,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进一步增强节俭意识,始终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并有针对性地提出领导干部要树立良好风气,拒腐防变。

三

长期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贫富差距的普遍存在和腐败现象引发的不和谐状态,并积极妥善地制定政策、措施逐步加以解决。可以说改善贫困人口的境遇,保护弱势群体,缩小日益扩大的财富和发展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收入分配是民生的三大支柱之一(另外两大支柱是就业和社会保障)。因为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促进经济效率和社会发展的保证^[11]。2005 年 10 月 11 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06 年 10 月 11 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两个文件对于缩小收入差别,促进社会和谐指明了方向。解决东西部地区差距问题,要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大力扶持欠发达地区和困难地区,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解决城乡差距问题,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农村要执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目前政府还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2007 年中央投入 3917 亿元,以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2007年上半年,国家对农村、教育、卫生的财政支出达1.7万亿,特别关注民生。解决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问题,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调整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严格实行工资总额控制制度。以成都市为例,2007年在岗职工工资水平增长率确定为12%左右,这就规定了垄断行业加薪要“封顶”。还规定垄断行业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已超过城镇职工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今年不宜再增长。必须纠正垄断行业的福利腐败,一些垄断行业向职工和家属提供廉价或无偿的资源,发放各种名目的补贴,在“福利”名目下形成行业腐败。

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的原则应当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这个原则的重点是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缓减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低收入者是什么社会都会予以关注的对象。国际社会比较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主要不是看有多少富翁,而是看该社会低收入者的状况如何。这正如木桶原理所述,长短不同的木板条组成的木桶,其盛水是不取决于长的木板,也不取决于各木板的平均长度,而是取决于最短的木板。这个原理也叫短线决定原理。如果中等收入者(按目前经济状况年收入6—8万可以算作中等收入者)达到70%的比重,社会居民收入的状况呈菱形(或橄榄形),社会就会比较稳定、和谐。

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和谐,还有一个前提,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在这个前提下,就要注意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解决因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区域、城乡、行业的收入差距问题。经济发展为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提供了条件,但是不等于说发展了收入,差距就自然解决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分配制度。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完善六种制度,其中就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摆脱贫困问题,不能不说到教育。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说,穷人之所以贫困,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12]。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为了解决教育的公平,中央特别提出公共教育资源要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

斜。教育资源倾斜的地区基本上都是经济发展落后地区。所以教育水平落后,是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要发展就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培养出各类人才,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进步。政府应加大对高、初中阶段助学金的投入。助学金主要帮助家庭贫困的学生完成学业。这与奖学金有一点不同的是,助学的对象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主要是贫寒的学生,而奖学金是奖励优秀学生。但是,不要小看一份助学金,上个世纪50年代,多少贫困子弟因获得助学金而实现初、高中毕业的愿望,最终升入大学,成为建设的人才。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金利来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先生。解放以后,他家境贫寒,政府在他上中学时,给了他一份助学金,后来升入中山大学本科毕业。他现在发达了成了富豪,可是他不忘人民政府的恩情、不忘共产党的恩情,他说,他之所以有今天是政府给的,是党给的。他生活上省吃俭用,把节俭的钱,生意上赚得的钱捐给了我国的教育事业,现在已捐了5.6亿多港币,真正做到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同时,根据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还应当建立覆盖全社会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2007年7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批准成都等79个城市为试点城市。中央财政将加大投入,重点补贴中西部。为了促进社会的稳定,还要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城市低保制度,让每一个居民至少能解决温饱,实现社会和谐。

腐败问题的存在,也危及到社会和谐。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建立制约权力运行的制度。2007年7月10日,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执行死刑。同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关于陈良宇严重违纪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陈良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他们二人的罪行各异,但根本的是以权谋私,贪污腐败。郑筱萸身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为伪劣药品、食品大开绿灯,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也有损我国国家形象。陈良宇支持上海市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违规贷给不法企业主和有关公司巨额社保基金,危害了社保基金安全,直接侵害了群众利益。一个是正部级领导,一个是

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严重违法犯罪,不应当姑息,应当严惩。由此可见,反腐败斗争是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征。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的日

子里,我们要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进一步改革开放,促进现代化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 [1]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人民日报,2008-02-29.
- [3]中国统计年鉴(200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 [4]收入分配的一个倾向与另一个倾向[N].21 世纪经济报道,2006-11-13.
- [5]2005 年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监测公报[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 [6]中国统计年鉴(2005)[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 [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人民日报,2007-03-01.
- [10]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
- [11]华建敏.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努力解决民生问题[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2).
- [12]刘易斯.五个家庭:墨西哥贫穷文化研究[M].秋延亮译.台北:牧童出版社,1976.

Social Harmony Improvement Through Narrowing Income-Gap

CHEN Si-jin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101, China)

Abstract: The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witnesses great achievements in China. However there exist problems as well, of which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wealth is a common concern of society. Presently a great concern is the excessive income-gap among social members, which tends to widen in social member property alloc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of China,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between different trades or professions. It is of necessity during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distortion enlarges it. Lack of governmental public policy and corruption affect the fairness and rationalit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mulates the relevant policy to narrow the gap and improve social harmony.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income gap; harmonious society

[责任编辑:李大明]